



袖珍经典

大学的兴起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大学的兴起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兴起 / (美)哈斯金斯(Haskins, C. H.)著；

王建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

书名原文：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ISBN 978-7-208-06740-0

I. 大… II. ①哈… ②王…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欧洲—中世纪 IV. G64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52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大学的兴起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1/32

印 张 3.75

插 页 4

字 数 59,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40-0 / K · 1289

定 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而为，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序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于 1870 年 12 月 21 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很小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将来精通古代和现代语言并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基础。五六岁时，跟随父亲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16 岁时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求学于巴黎和柏林，不到 20 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12 年之后，哈斯金斯于 1902 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 1931 年因身体状况不佳退休。1937 年 5 月 14 日在剑桥逝世。

在哈佛任教的漫长岁月里，哈斯金斯逐渐变成了该大学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原因不仅仅在于 1908—1924 年间他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职，最重要的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关于哈斯金斯性格的基本特征，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三个同事在他去世时作了最简洁明了的概括：

把历史视为一门自由艺术和一门人文科学的他授课时朝气蓬勃、积极进步，高年级历史专业的学生皆从中受益匪浅，因为每个人都选修他的一门甚至更多课程，在学院辩论会上他独领风骚，许多难题在他那里迎刃而解，从一开始他就显露出一位学院院长所具备的才能，尽管他几次拒绝如此重要的任职邀请。他谈吐幽默风趣，喜爱长时间散步，他是自己交际圈里最受宠爱的人，也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他内心极其虔诚，笃信宗教，很快就使自己变成了哈佛大学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并留名于哈佛伟人史册之中。^[1]

由于具备一名卓越能干的管理者和事务家的天赋，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哈佛大学。在活跃的学术生涯中，他在美国许多重要学术组织中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和美国学术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极负盛名的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巴黎和平代表团的成员，时任西欧区主席。

哈斯金斯的学术研究集中于 11 至 13 世纪的中世纪盛期，他最早的兴趣之一是研究法国北部的社会制度，在深入细致地调研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最终于 1918 年出版了《诺曼社会制度》一书，此书成为该时期英法社会制度的权威性著作。另一个让哈斯金斯感兴趣的广阔领域是

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在这个领域里，他尤为关注中世纪盛期的科学史。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许多纷繁芜杂的问题，由于对欧洲现已收集的原始资料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因而他能够利用迄今尚未被使用的原始资料，对这些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哈斯金斯毕生研究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两本论文集：《科学史研究》（1924年；1927年，第二版）和《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不过除了这些专题性研究，他还创作了一部令人异常兴奋的综合性著作《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此书刚一出版就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读者。

他的朋友 F·M·波威克曾经评价说，“哈斯金斯喜欢做自己的‘推广者’”。^[2]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一系列讲座论述“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的重要性，并于1925年将其出版。1923年，他在布朗大学举办三次讲座概述他对“大学的兴起”的看法，从而为世人提供了一本简明扼要、生动逼真的著作，迄今无人能出其右。

1929年，为庆祝执教40周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中世纪史研究纪念文集》出版发行，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广泛兴趣和独创性反映了他们曾经从导师那里得到的启发和训练。

集合办事高效的组织者、见解新颖的学者和讲课精彩的教师这三种人的品质于一身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

哈斯金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法国中世纪史专家 F·茹翁·德·隆尔格雷的话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确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复兴的灵魂”。

西奥多·E·莫姆森

康奈尔大学

注释：

[1] 引自 R.P.Blake, G.R.Coffman, and E.K.Rand., *Speculum* 中的讣告, XIV (1939), 414.

[2] 参见 F.M.Powicke 撰写的有关哈斯金斯的文章, 载《英国历史评论》, LII (1937), 653.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最早的大学 / 1

导论 / 1

博洛尼亚大学与南方 / 5

巴黎大学与北方 / 11

中世纪的遗产 / 18

第二章 中世纪的教师 / 23

学习与教科书 / 23

教学与考试 / 33

学术地位与学术自由 / 42

第三章 中世纪的学生 / 49

信息来源 / 49

学生手册 / 55

学生书信 / 63

学生诗歌 / 69

总结 / 77

文献简介 / 81

索引 / 92

第一章

最早的大学

导论

1

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犹如中世纪的大教堂和议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有大学——已经连续使用了七八个世纪的“大学”一词所指代的教育机构——虽然听起来或许有点儿匪夷所思。他们有高等教育，但它不是大学的同义语。他们在法学教育、修辞学教育和哲学教育上取得了许多令后人自叹不如的成就，但他们的教育并未发展成永久性知识机构的组织形态。像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的伟大教师不会发给学生毕业文凭；假设现代的一个学生拜在苏格拉底门下三个月的话，他一定会向他索要一个证书，一个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的、外在的东西——顺便插一句，这将是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的一个绝佳主题。只是到了12、13世

2 纪，世界上才出现了具有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那些特征的有组织性教育，即以系科(faculty)、学院、学习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现代人都是巴黎和博洛尼亚而非雅典和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和接班人。

最早的大学和现代大学之间当然存在巨大且显著的差异。在起源时期，中世纪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也没有捐助基金和属它所有的建筑物；它可能满足不了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的要求！正如来自美国一所年轻大学的一本历史教科书所言，除了潜意识里带有一点儿地方性色彩之外，它“在物质存在方面不带有一丁点儿对我们来说不言而喻的特征”。依据帕斯奎尔(Pasquier)经典而古老的习惯用语，中世纪大学是“人的组合体”(*bâtie en hommes*)。这样的大学没有理事会；不颁发任何行事一览表；没有学生社团——除非这所大学本身起源就是一个学生团体——没有学院报刊，没有演出活动，没有体育运动，更没有现代美国学院“校外活动”（它们是美国学院内部不活跃的主要理由）中的任何一个。

尽管差异很大，以下的事实依然改变不了，20世纪
3 的大学是中世纪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直系后裔。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砍砸打磨出来的那块岩石；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挖掘疏理出来的那条壕沟。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组织是一样的，历史的延续性并

未中断。巴黎和博洛尼亚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大学传统，这个共同的传统属于我们所有的高等知识机构，不管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而且所有学院和大学的人都应该了解和珍惜这个传统。这些最早大学的起源和性质是我们接下来三个章节的主题。第一个章节将论述大学的制度，第二个章节涉及大学的教学，第三个章节论及大学学生的生活。

近年来，大学的早期历史已经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郑重其事的关注，中世纪的知识制度终于被人们从神话和传说领域里——在这里，它们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提升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建立并非千年庆典，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属于英王阿尔弗烈德(Alfred)的众多丰功伟绩中的一件；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也不能追溯到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巴黎大学在查理曼(Charlemagne)时期以及接下来的近四个世纪内并不存在。人们很难意识到——即使对现代人来说尚且如此——许多东西没有创建人，或者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⁴相反“只是在成长”，缓慢地、悄无声息地产生，没有明确的记录。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经过奠基人德尼弗莱(Denifle)^[1]和黑斯廷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2]以及当地古文物研究者的研究，最古老大学的开端仍然不甚明朗，而且常常难以断定，因此我们有时必须使自己满足于一些非常笼统的陈述。

大学产生的时期是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不过它

不是这一术语通常适用的 14、15 世纪的复兴，而是更早时期的复兴，尽管鲜有人知，但从某个合适的角度来看，它与 14、15 世纪的复兴一样意义重大，历史学家现在将其称之为 12 世纪文艺复兴。只要知识一直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自由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就不会出现大学，因为除了当作学校课程之用的文法、修辞、逻辑这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和更为基本的算术、天文、几何、音乐概念之外，再没有其他知识可以传授了。无论如何，在 1100 年至 1200 年间，一股新的知识潮流以强劲的势头涌入了西欧，其中一部分经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不过主体部分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引进来，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托勒密(Ptolemy)和古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的算术论著以及在黑暗时代里被掩蔽起来的罗马法教科书。除了三角形和圆的基本命题以外，欧洲业已拥有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的论著，自此以后，它们一直被当作学校和学院的学习课程；费力的罗马数字运算被取代了——至于费力到什么程度，诸位只要通过尝试使用这些数字进行一个简单的乘法或除法运算，就很容易明白了——现在借助阿拉伯数字，人们就有可能简便快易地进行运算了；博提乌斯(Boethius)也被取而代之，“众师之师”(Master of them that know)成为欧洲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教师。至此，人们也拥有了古代法学和医学方面的全部知识。这股新的知识潮流冲破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

职业；它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就像下一个时代里乔叟(Chaucer)笔下的牛津教士“心甘情愿求学，心甘情愿传授”——翻山越岭、越洋过海，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亞，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给了我们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定义，教师和学生的社团。

在涉及 12 世纪的概括性叙述中，萨莱诺的医科大学是一个有所偏爱的例外。萨莱诺距离那不勒斯南部约一天的旅程，这里最先是伦巴底人的领地，后来变成诺曼⁶人的领地，不过仍然与希腊东部来往密切，早在 11 世纪中期这里就有一所医科学校，大致在 200 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中心。在这个“希波克拉底之城”，古希腊的医学著作一直在被阐释着，甚至在解剖学和外科手术方面有所发展，它们的教导则被压缩成精辟的保健法格言——“饭后百步走”等等——至今依然流行。对于 1231 年之前萨莱诺学校的组织情况，我们一无所知。而当那一年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插手制定标准规范它的学位时，它已经远远落后于北边的新大学了。尽管在医学史上地位重要，萨莱诺大学对大学制度的发展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博洛尼亞大学与南方

如果说萨莱诺大学在时间上发展较早的话，博洛尼亞大学则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萨莱诺大学仅仅是著名的医学中心，而博洛尼亞大学却是

多方面发展的机构，尽管它主要以罗马法复兴中心的身份享誉欧洲。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罗马法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并未销声匿迹，只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它的影响大大削弱了。伴随着日耳曼法典的出现，罗马法以罗马人习惯法的形式幸存下来。⁷（不过）不再通过伟大的《查士丁尼法典》而为世人所熟知，而是流传在许多初级的手册和格式书(*form-books*)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法变得愈加薄弱和贫瘠。《法理汇要》(*Digest*)——《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最重要的部分——在603至1076年间就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两份手抄本幸存下来；用梅特兰(*Maitland*)的话说，它“死里逃生”。虽然法律研习持续下来了，但就是有的话，也仅仅被当作文献起草的一种训练——应用修辞学的一种形式。然后，在11世纪晚期，与贸易和城市生活的复兴紧密相连，法律的复兴出现了，这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次法律复兴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好多地方，或许最先并不在博洛尼亚，但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和现在一样，这一优势在当时就使这座城市成为意大利北部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它(法律)旋即就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中心。1100年前的某个时间里，我们听说了一位名叫佩波(*Pepo*)的教师，他被誉为“博洛尼亚的辉煌灿烂之光”；至1119年，我们遇见了“学术之城博洛尼亚”(*Bononia docta*)这一习惯用语。在博洛尼亚，就像在巴黎，有一位伟大的教师伫立在大学发展的开端之上。这

位给予博洛尼亚声誉的教师名叫伊尔内里乌斯(Inerius)，他或许是中世纪众多伟大法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至于他著述过什么教授过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学者们争论⁸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似乎在广泛使用完整的《民法大全》——相比较于前几个世纪里贫乏的罗马法概述而言——的基础上确立了“注解”法律教科书的方法，他完全并最终将罗马法从修辞学中分离出来，而且牢固地确立了罗马法作为专业研究学科的地位。然后，大约在1140年，圣费利斯修道院(San Felice)的修士格拉提安(Gratian)，编写了《圣令集》(Decretum)，这本书成为了教会法的标准教科书，并由此使教会法以高等教育的一门显要学科的身份同神学区分开来；博洛尼亚作为法律学校的卓越地位完全确立了下来。

学生阶层业已出现了，在书信和诗歌里，他们都如此表述自己。而且至1158年，意大利的学生阶层已经变得足够重要，以至于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正式授予他们权利和特权，尽管没有具体说明授予哪座城市或哪所大学的学生。至此，博洛尼亚已经变成了数百名学生的常去之地，他们不仅来自意大利，而且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地方。由于远离故土，又没有防卫手段，他们就联合起来寻求彼此间的保护和援助，这个外来学生或者异邦学生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端。在这个联合体中，他们似乎效仿了普遍存在于意大利的行会的例子。事实上，一般说来，大学一词最初就